

《神农书系》主编：温铁军 孔祥智



Shennong
Series

生产组织方式、市场交易类型
与生鲜乳质量安全：
“后三聚氰胺时代”
中国奶业发展模式审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71203227)
教育部高校博士点基金项目 (20120004120002)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本书得到 2010 年度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支持



生产组织方式、市场交易类型 与生鲜乳质量安全：

“后三聚氰胺时代”
中国奶业发展模式审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71203227)

教育部高校博士点基金项目 (20120004120002)

中国农业出版社
北京



钟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产组织方式、市场交易类型与生鲜乳质量安全：
“后三聚氰胺时代”中国奶业发展模式审视 / 钟真著.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3

ISBN 978-7-109-17643-0

I. ①生… II. ①钟… III. ①乳品工业—经济发展模
式—研究—中国 IV. ①F42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5083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刘 玮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19

字数：278 千字

定价：42.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神农书系》编委会 ▶

主编

温铁军 孔祥智

编委（以姓名笔画排列）

马九杰 王志刚 孔祥智

朱信凯 刘金龙 汪三贵

张利庠 周立 郑风田

唐忠 唐晓纯 曾寅初

温铁军

Rigoberto Lopez

Scott Rozelle

Thomas Reardon



《神农书系》总序 / / Shennong Series

科学研究与问题意识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随自身科研竞争力的提高，从建院第5年之2009年起资助本院教师科研成果出版，是为神农书系。本文针对学术界之时弊而作，引为总序。

一、问题：关于科学的问题意识

1. 科学不必“实技求术”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时候，我被公派到美国学习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①。第一次上课，教师就先质疑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什么是科学成果？按照自然科学领域公认的实验程序简而言之——只有在给定条件下沿着某个技术路线得出的结果可被后人重复得出，才是科学成果。

亦即，任何后来者在对前人研究的背景条件有比较充分了解的情况

^① 我是1987年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被上级公派去美国密执安大学进修社会科学研究方法（1980—2000年的20年里先后3次去了以方法论见长的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ICPSR进修学习）；后续培训则是在世界银行总部直接操作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制度转轨的援助项目；随后，即被安排在中国政府承接世界银行首次对华政策性贷款的工作班子里，从事“监测评估”和应对世界银行组织的国外专家每年两次的项目考察评估；这就使我在1980—1990年的农口部门有了直接对话世界银行从发达国家聘请的经济专家和从事较高层次的涉外研究项目的机会，因此，当年被人戏称为农村政策领域中的“洋务派”。此外，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介入了第一个专业的“中国社会调查所”的早期研究，1988年参与了“中国民意调查中心”的民间创办，1990—1992年实际主持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创办和科研工作；还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直接操作过以全国城乡为总体的抽样调查，后来在农业部负责过多个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以县级为总体的抽样框设计和调查数据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参与了很多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立项评估或结项评审。因此，本文实属有感而发，目的在于立此存照。

下，假如还能沿着其既定的技术路线重复得出与前人同样的结果，那么，这个前人的研究，应该是被承认为科学的研究……如此看来，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社会科学成果，都因后人难以沿着同样的技术路线重复得出与前人同样的结果，而难以被承认为科学！由此，无论东西方的研究只能转化为对某种或者某些特定经验归纳出的解释性的话语。

由于这些话语的适用性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有限，因此，越是无法还原那个时空条件的研究，就越是体现了人们追求书斋学术的“片面的深刻”的偏执。

也许，除了那些“被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因内在地具有政治正确而不应该列入科学性讨论之外，人类文明史上还不可能找到具有普遍意义或者普世价值的社会科学成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强调的科学化虽然在提法上正确，但在比较浮躁的意识形态化的氛围之中，却可能成为普遍化的学术造假的内在动因。因为，很多以“定量分析”为名的课题研究尽管耗资购买模型而且有精确的计算，却由于既缺乏“背景分析”，也没有必须的“技术报告”，而既难以评估，也难以建立统一标准的数据库。更有甚者，有些科研课题甚至连做研究最起码的“基本假设”都提不出来，有些自诩为重大创新的、经院式的理论成果，却需要进一步讨论其理论逻辑与历史起点是否吻合等基本常识……

这些实际上与科学化背道而驰的缺憾，往往使得后人不能了解这种大量开展的课题研究的真实依据。如果科研人员不知道量化分析的基本功，不了解数据采集、编码和再整理、概念重新界定等各个具体操作环节的实际“误差”，就很难保证对该课题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评价。对此，国内外研究方法论的学者多有自省和批评。

再者，由于很多课题结题时没有明确要求提供受国家基金资助所采集的基础数据和模型，不仅客观上出现把国家资金形成的公共财产变成“私人物品”的问题，而且后来者也无法检验该课题是否真实可靠。

何况，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作为两种分析方法，本来不是对立的，更没有必要人为地划线界定，非要偏向某个方面才能证明研究课题的科学性。

可见，科学研究还是得实事求是地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必



刻意地“实技求术”，甚至以术代学。方法无优劣，庸人自扰之。如果当代学者的研究仍然不能具备起码的科学常识——理论逻辑的起点与历史经验的起点相一致，则难免在皓首穷经地执着于所谓普遍真理的进程中跌入谬误的陷阱！

2. 农经研究尤须分类

如果说，早期对不同方法的学习和实践仅形成了对“术”的分析；那么，后来得到更多条件从事大量的与“三农”发展有关的国际比较研究之后所形成的认识，就逐渐上升到了“学”的层次。诚然，面对中国小农经济的农业效率低下、农民收入徘徊的困局，任何人都会学看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但却几乎很少人能看到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教训。

我们不妨从农经研究的基本常识说起——

如果不讨论未涉及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那么，由于农业自身具有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使其在世界近代通过殖民化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文明史中没有被根除，因此，工业化条件下的世界农业发展分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

一是前殖民地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大农场农业——因殖民化造成资源丰富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规模化和资本化，对应的则是公司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

二是前宗主国（欧盟为代表）的中小农场农业——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而资源有限，只能实现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60%农场由兼业化中产阶级市民经营，因此，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普遍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高度相关的绿色运动从欧洲兴起。

三是以未被彻底殖民化的居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农户经济——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

由此看来，中国属于何者，应该借鉴何种模式，本来也是常识问题。如果做得到“去意识形态化”讨论，那就会愿意借鉴本文作者更具

生产组织方式、市场交易类型与生鲜乳质量安全：“后三聚氰胺时代”中国奶业发展模式审视 ▶
《神农书系》总序 ▶

有挑战性的两个观点：

其一，依据这三种类型之中任何一种的经验所形成的理论，都不可能具有全球普适性。

其二，这三种类型之中，也都没有形成足以支撑“农业现代化”成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成功典范^①。

中国之于1956年提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一方面是那时候在发展模式上全面学习苏联，并为此构建了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和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客观上也是迫于城市工业部门已经制造出来的大量工业产品急需借助国家权力下乡的压力——如果不能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中国人改革之前30年的国家工业化是难以通过从三农获取原始积累来完成的。

时至今日，虽然半个世纪以来都难以找到几个投入产出合理的农业现代化典型，人们却还是在不断的教训之中继续着50多年来对这个照搬于先苏后美的教条化目标的执着，继续着对继承了殖民地资源扩张遗产的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经验明显有悖常识的片面性认识。

显然，这绝对不仅仅是农经理论裹足不前的悲哀。

二、学科基础建设只能实事求是^②

以上问题，可能是国家资助大量研究而成果却难以转化为宏观政策依据、更难以真正实现中国话语权及学术研究走向国际性的内在原因。甚至，令学术界致毁的、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愈演愈烈，真正严肃的学术空气缺乏，也使得这种科研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各个学科“小圈子”内部分配——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几乎难以避免地导致当今风行的学术

① 参见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一版。

② 2004年暑假，当我以53岁高龄被“引进”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之职的时候，曾经有两种选择：其一是随波逐流、颐养天年；其二是最后一搏、力振科研。本能告诉我，只能选择前者；良知却迫使我选择了后者。执鞭至今五年有余。在校领导大力支持和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下，本院借国家关注“三农”之机，一跃成为全校最有竞争力的院系之一：教师人均国家级纵向课题1.5个，人均课题经费30万；博士点从1.5增加到4.5个，还新组建了乡村建设中心、合作社研究院、可持续高等研究院、农村金融研究所等4个校属二级科研教学机构。其间，我虽然了解情况仍然不够全面，但对于现行教育体制问题的认识还算比较新鲜；再者，在这几十年来的“三农”研究中，有很多机会在国外著名高校学习交流，或在几十个国家的农村进行考察，也算有条件做些比较分析。于是，便就科研进一步服务于我国“三农”问题的需求提出这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



造假和教育腐败。

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实事求是地抓好基础建设。

首先是清晰我们的问题意识，从本土问题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敢于挑战没有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理论观点。当然，一方面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化的讨论；另一方面，尤须警惕海内外任何具有意识形态化内涵的话语权争论被学术包装成科研成果；尤其是那些被广泛推介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在农经界，主要是力戒邯郸学步和以术代学等多年来形成的恶劣学风的影响。

其次是改进定量研究。如果我们确实打算“认真”地承认任何一种新兴交叉科学在基础理论上的不足本身就是常态，那么对于新兴学科而言，最好的基本研究方法，其实恰恰是“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试验研究和新近兴起的文化人类学的参与式的直接观察，辅之以采集数据做定量分析。同时，加强深入基层的科学试验和对个案的跟踪观察。近年来，国外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讨论，已经不拘泥于老的争论，开始从一般的“个案研究”演变为资料相对完整、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故事研究”。我们应该在现阶段仍然坚持定性与定量分析并重的原则，至少应该把参与式的试验研究和对不同个案的实地观察形成记录，都作为与定量分析同等重要的科学方法予以强调。否则，那些具有吃苦耐劳精神、深入基层从事调查研究的学者会越来越少。

再次是改进科研评价体系。我们在科研工作中应该修改开题和结题要求，把支持科研的经费综合统筹，从撒胡椒面的投入方式，转变为建立能够容纳所有国家资助课题的数据库和模型的共享数据系统，从而，对研究人员的非商业需求免费开放（个别需要保密的应该在开题前申明），以真正促进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繁荣；同时，要求所有课题报告必须提交能够说明研究过程的所有环节出现的失误或偏差的“技术报告”（隐瞒不报者应该处罚）；要求任何重大观点或所谓理论“创新”，都必须提供比较全面的相关背景分析。

既然中国人的实事求是传统被确立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那就从我做起吧。

（2009年国庆中秋双节于北京后沙峪）



本书序 / / Shennong Series

钟真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生产组织方式、市场交易类型与生鲜乳质量安全：“后三聚氰胺时代”中国奶业发展模式审视》经修改后即将出版，邀我作序。作为他的导师，我愿意借此机会说几句话。一来表示祝贺，二来对书中阐述的主题及研究生培养问题谈一点看法。

我们这个团队对奶业经济问题的关注，始于2007年我院和利乐公司合作成立学院下属的“中国人民大学—利乐奶业研究中心”，核心成员除我之外还有张利庠教授、朱信凯教授、钟真博士、张喜才博士、谭智心博士，以及内蒙古农业大学乔光华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云华副研究员等。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团队，多年来一直跟踪奶业发展问题，不敢说成就，但起码已经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心得和观点。几年来，有多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出自中心课题的研究（主要由利乐公司资助），钟真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其中之一。

在调研中一位农民朋友对我说过一句话：“农民真的不容易，不仅城市人（他指的是市场价格的波动），就连不起眼的虫子都欺负我们。”这句话用在奶农身上同样适用。以20世纪90年代末期蒙牛的崛起为标志，中国奶业进入了超高速发展时期。奶企赚了个盆盈钵满，但奶农一直举步维艰。刚刚有了起色，便于2008年遭遇了使整个奶业大伤元气的“三聚氰胺事件”。我是在飞机上读英文版的《中国日报》知道这个消息的。这份报纸的报道是：“‘不法奶农’往牛奶里掺杂三聚氰胺导致了长期食用三鹿奶粉的婴幼儿中毒”。看到这条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板子怎么会打在奶农身上？我不禁为奶农的命运担忧起来。

同时，作为生产商，三鹿为此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但此后各地行政部门为了一劳永逸地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都不约而同地开展了“消灭

小规模奶农”的行动。在北方奶区，奶牛养殖基本上全部进入了由各类主体经营的养殖小区养殖阶段。由于养殖的固定成本大大提高，奶农必须达到一定的养殖规模才有可能在小区生存下来（在河北一般为20头奶牛以上），“小规模奶农”真的被“消灭”了。

这种处理方式是不科学、不规范的，因为它没有真实考虑奶农的利益，因此，我们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影响奶业发展的最大因素是奶企和奶农的利益联结机制。对于“三聚氰胺事件”的处理，并没有改变或者改善已经严重扭曲的利益关系。近年的调研结果表明，奶农的地位反而更低了，在夏季，鲜奶被拒收的情况有增无减。

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奶农的养殖规模和牛奶的质量与安全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是怎样的？于是就有了主要由钟真博士完成的这个课题。我很高兴地看到，钟真博士等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圆满地完成了最初设定的任务，得出的结论主要有：①在奶业生产模式上，小规模散户养殖具有经济合理性；②农户的养殖规模主要影响生鲜乳的质量（如干物质和蛋白质的含量等），而交易方式则对生鲜乳的安全性造成重要影响。这一结论具有极其现实的政策含义。也就是说，仅仅扩大养殖规模是无法提高生鲜乳的安全性的，必须在交易环节上严格把关，才有可能杜绝类似于“三聚氰胺事件”的事件发生，消费者才有可能真正喝上“放心奶”。在现实中，地方政府部门必须严格控制乳品企业的奶源收集方式和质量安全控制方式，并促进乳品企业和奶农之间形成方向一致的利益联结机制。

实际上，我们在四川看到的情况是：养牛户高度分散在每一个山村，根本不可能像北方地区把牛牵到一个地方挤奶；奶农挤奶后马上放在冰箱里，并用摩托车很快运送到企业收奶站；收奶站对每户都取样留存，直到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为止。由于责任所在，企业对每个农户所交鲜奶的检查是极为严格的。四川（包括其他南方奶区）奶牛养殖的自然条件极差，在炎热的夏季，鲜奶如果挤得不及时，很容易就变酸了。但我们都知道，四川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三聚氰胺事件”那样严重的奶业安全事件。由此我们坚信，政府管住企业这头，奶业的安全问题才有保障。事实证明，“三聚氰胺事件”以后北方奶区的普遍做法——县级监



管部门往每个奶站都派驻一名驻站员，对奶站进行不间断的监控，是无法长期坚持的，否则，县级政府部门的编制可能要大大增加了。何况还有其他很多领域也需要这样的监控呢？因此，抓住“牛鼻子”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方式。我们经常听到的“五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牛”的说法，实际上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抓住关键环节，即“牛鼻子”。管的人多了、环节多了，反而会造成扯皮，哪还能管好？

下面谈谈研究生的培养问题。

钟真是我带的研究生中学术水平较高的，这当然与个人的勤奋程度有关，但培养的方式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我一向强调做学问要有“感觉”，很多学生一头雾水：“感觉？怎样才能有感觉？”我说，一要多读书；二要多调研。我们做不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也是我自己努力的方向），那么，“读千卷书，行千里路”，能不能做到？因此，一旦某位同学确定由我来带，我会很快给他发去《必读书目》，列举数十本我认为必读的书籍，其中有经济学经典著作、研究方法类著作、当前政策类著作等。要求在写论文之前必须把这些著作读完。

除了《必读书目》，我还要求我指导的研究生每两周开一次读书会，不仅指定了每次精读的书目，还要求撰写读书笔记，并在读书会上介绍读书体会。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在强迫同学们不仅要把指定的著作读透，还要深入思考，有时候还要拓展阅读。一位同学主发言后，其他同学补充或即席发言，大家互相启发，尤其是上个年级的师兄、师姐，他们的发言更有启发性。读书会上读的书，极少与《必读书目》重复，有基础性的经典著作，也有为课题研究打基础的经典著作。这样长期积累下来，学生们读的书就比较可观了。

据我所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很多教授都有读书会制度，都注重学生读书习惯的培养。如全志辉老师带着学生读类似于《国富论》那样的经典著作，把清华大学等兄弟院校的学生都吸引来了，大家一起谈读书体会，其乐融融，感受很深。因此，读哪些书，怎样读书，我还需要向同事们学习。温铁军老师不仅每次都出席自己指导的研究生的读书会，还每次都亲自解读，这样的认真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读书是打基础的必要过程，而农业经济管理本质上是致用性学问，因此，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是极其重要的，也是检验读书成效的唯一方式。我的运气比较好，主持省部级和国家级课题的时间比较早，这就给我指导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培养研究能力的条件。因此，我指导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到几个省去调研是非常正常的事，有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加起来，能够去十几个省。这样的经历，不仅增长了见识，锻炼了与人交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实际问题的把握，了解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锻炼的成效首先反映在学位论文上，更重要的反映在就业以后对工作的适应速度和程度上。

在读书和调研的基础上，我还给学生开方法课——农林经济管理方法论，主要讲如何提出问题、如何根据问题提出假说、如何撰写开题报告、如何进行研究及验证假说等。我自己讲一点理论，主要请毕业的几位博士回来讲自己的论文研究过程，有我自己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有别的老师指导的，他们的论文都是比较优秀的。然后，请上课的同学谈自己论文的设计，并帮助他们形成研究思路。事实证明，这样的课程很有必要。这门课现在由我和钟真博士合开，他不仅讲自己论文研究的过程，还具体指导同学们确定论文研究方向。这个学期请回来“反哺”母校的毕业生有张云华、贺达水、方松海、涂圣伟、武振军、谭智心、阮荣平等。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告诉大家，钟真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中读书最多、最认真，同时也是参加调研最多、发表文章最多的学生之一。这几个“最”明显反映在本书中，没有这几个“最”，本书要写到这个水平是不可能的，相信大家读过之后就有所体会。我衷心期望钟真博士能够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也期望别的学生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

就啰嗦这么多吧。估计序言没有这么写的，我这么写了，也可以算作创新？

孔祥智

2012年12月23日



摘要

奶业是一个目标多元化的特殊产业，它不仅承担着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使命，更蕴涵着改善国民饮食结构、增强国民体质的重大战略意义。但随着中国奶业的高速发展，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其实现多元化目标的“绊脚石”。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使人们对奶业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关注重点，从乳制品环节进一步延伸到了生鲜乳环节。奶农、奶站、乳品企业等构成的生鲜乳供应链的市场主体，成了人们反思奶业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根源的重点对象。而“取消小规模散养”和“取缔个体私营奶站”等措施也成了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治理手段。事实表明，在当前以家庭式小规模散养为主的生产组织方式和以经由生鲜乳中间商（奶站）销售为主的交易方式所共同形成的奶业发展模式下，生鲜乳质量安全水平的确较低：不仅在营养成分的含量上处于较低水平，而且在影响人体健康的安全方面也存在重大隐患。但是，政府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并没有获得理想的效果：家庭式小规模散养的生产组织方式仍然占主要地位，具有中间商特征的奶站依然大量存在。那么，中国奶业究竟该如何调整其发展模式，才能既保障生鲜乳的安全又提高生鲜乳的品质呢？这是当前中国奶业面临的战略问题，也是奶业治理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而要破解这一问题，从逻辑上必须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关联性问题。首先，当前的奶业发展模式的确影响了生鲜乳质量安全吗？即以家庭式小规模散养为主的生产组织方式和以中间商（奶站）销售为主的交易类型是否影响了生鲜乳质量安全，并且是如何影响的？其次，既然小规模散养方式和中间商（奶站）销售为主的交易类型在当前的奶业发展环境下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那么小规模奶户和中间商（奶站）的存在是否有其自身的经济合理性呢？最后，在乳品企业占据买方（寡头）垄断地位的市场条件下，政府该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来改进生产组织方式和优化市场交易类型以保障生鲜乳的质量安全？

本书的主要工作正是基于上述问题展开的，而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是从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已有理论研究的空白出发的。通过分析大量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国内外文献发现，①很少有研究以“整体的质量安全观”（即将质量细化为品质和安全两个方面）来研究质量安全问题，更多的文献仅单一地关注安全问题；②在质量安全问题产生原因的解释方面，目前从农产品生产组织形式、供应链交易方式、垄断的市场结构等较为抽象的角度来分析的研究总体偏少；③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治理的措施方面，目前学者们从政府规制角度进行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对生产、流通到加工环节的市场自我约束机制的相关研究还不多，而且对于政府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治理品质和安全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为此，本书以质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将质量安全细化为品质和安全两个方面的“全面质量安全观”为研究视角，以奶户、奶站、乳品企业、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按照奶业产业链的基本结构，对奶业发展模式与生鲜乳质量安全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证的深入分析。在大量抽样数据和案例资料的支持下，本书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奶业发展模式的确影响了生鲜乳质量安全水平，而且在“全面质量安全观”视角下，作为奶业发展模式的“横”、“纵”两个方面——生产组织方式和市场交易类型对生鲜乳品质和安全的影响侧重点不同。其中，在控制了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生产组织方式比市场交易类型更为显著地影响生鲜乳品质，而市场交易类型比生产组织方式更为显著地影响生鲜乳安全。因此，从改造产业发展模式的角度去治理生鲜乳质量安全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缺乏针对性的治理显然也是不可取的。

第二，在当前最主要的生鲜乳生产组织方式——家庭式小规模散养下，奶户提高质量安全而带来的成本变动将大于生鲜乳质量安全的变动，即生鲜乳质量是规模不经济的，故奶户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进生鲜乳质量安全。但是这种生产组织方式较园区化规模养殖方式更为符合散养奶户劳动密集型的资源禀赋特征，更能促进家庭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故其长期存在着充分的经济合理性。

第三，在当前最主要的生鲜乳市场交易类型——中间商模式下，中间商（奶站）因社会化服务功能不能有效发挥、质量安全管理执行不力而对



生鲜乳品质和安全均存在着负面影响。特别是在质量安全问责机制和市场自我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中间商（奶站）引发生鲜乳安全问题是一种必然趋势（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存在着规避的可能性）。同时，尽管中间商（奶站）改变了生鲜乳供应链的利益分配格局，侵占了奶户的利益，但改进了生鲜乳供应链的整体经济绩效，故中间商（奶站）的普遍存在也有着充分的经济合理性。

第四，买方（寡头）垄断的生鲜乳市场结构与奶业发展模式的形态特征密切相关，即生鲜乳生产组织方式和市场交易类型将受到具有买方势力的乳品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的制约，因此，乳品企业的奶源收集方式、奶款支付方式及质量安全控制方式等具体策略对生鲜乳的质量安全具有显著的影响。

第五，政府管制作市场失灵时的一种替代工具，对生鲜乳质量安全具有显著影响，但是不同经济学特征的管制措施对于生鲜乳品质与安全问题的治理具有不同的效果，即经济性管制对生鲜乳品质问题的治理更为有效，社会性管制对生鲜乳安全问题的治理更为有效，不符合这一“基本准则”的管制措施都可能会产生明显的偏差。

上述结论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在全面看待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调整当前奶业发展模式是改进生鲜乳质量安全的首要选择。其中，改进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在于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扭转小规模散养下生鲜乳质量安全规模不经济的现状，而不是简单地用园区化方式取代家庭式小规模散养；改进市场交易类型的关键在于完善生鲜乳流通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监督与问责机制，而不是简单地取缔中间商（奶站）；同时还必须重视具有买方势力的乳品企业在奶源收集方式、奶款支付方式及质量安全控制方式等方面的行为选择与生鲜乳质量安全的关系到，而不是简单地采取龙头企业支持策略。事实上，在生鲜乳质量安全问题的治理中，政府管制应与市场机制互相促进，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管制应以“全面的质量安全观”为指导，按照有针对性治理的“基本准则”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方能有效地实现品质提高和安全保障的目的。

可见，要保障生鲜乳质量安全，需要生鲜乳供应链上各个主体以及外部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中的相关主体共同努力。因此，解决生鲜乳质

{ 生产组织方式、市场交易类型与生鲜乳质量安全：“后三聚氰胺时代”中国奶业发展模式审视 ▶
摘 要 ▶

量安全问题的途径显然不是唯一的。但纵观目前国内外经验，发展规范的奶农专业合作社或许是中国奶业发展模式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但这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